《北雁南飞》的文学社会学考察（提纲）

——兼论“文学事实”的“社会化”

汤文益

埃斯卡皮在其《文学社会学》“中文版序”开篇，祭出20世纪上半叶法国大学评论界巨擘、实证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朗松。据埃斯卡皮描述，朗松“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方法存在着缺点；他明白仅仅满足于研究作家生平、作品介绍以及作品的形式内容分析，即使抱着最严谨的治学态度，也不足以揭示文学现象的种种奥秘。”[1]29显然，埃斯卡皮的用意不是介绍或解析朗松，而是要表明：在“反朗松”或“后朗松”时代，他的文学社会学已经提供了一种抵达文学现象“种种奥秘”的可能。那么，若遵从文学社会学的原则和方法，能否获取张恨水《北雁南飞》乃至其个人创作更多的奥秘？本文将重点考察《北雁南飞》的思想史“坐标”，探析作品生产、传播和消费诸环节的社会学机制，并在此过程中反思“文学事实”的“社会化”问题。

“思想史”是对不同历史时期集体意识及社会思潮的考察和描述。埃斯卡皮认为，“思想史”一旦产生，便成为深入理解文学事实所必不可少的内容。考察《北雁南飞》的思想史“坐标”，我们发现，张恨水写作《北雁南飞》（1935）前后，启蒙与救亡成为时代的“双重变奏”，启蒙与救亡相互促进，救亡尚未全面压倒启蒙，在此情势下，《北雁南飞》至少有三个面向或维度：文化惯性的遗存；新文化运动“改造国民性”的启蒙主张；“五四”运动开启的救亡—革命浪潮。

一、才子佳人模式与文化惯性的遗存

有资料认为，《北雁南飞》是比较典型的旧式才子佳人小说。这样的论断虽失之粗暴，也非空穴来风。如果说，主人公李小秋的原型是少年张恨水，那么，李小秋对《红楼梦》《西厢记》的喜爱、顺河寻诗、以惜花少年自称等兴趣格调，就是张恨水对个人阅读史、经验史和人生趣味的梳理和提炼：旧式才子的形象昭然若揭。文本生产者当然要讲求超越个体的囿限，但要彻底斩断其文化和价值之根，绝非易事。显然，张恨水无意于了断其与文化传统的纠葛，他选择了一种更合乎情理的路径，那就是“顺其自然”，不像启蒙与救亡那样决绝。也许，这种对文化惯性（传统）温情脉脉的眷顾和怀恋，正是张恨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游离于主流文学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但恰恰是这种游离，又显示出张恨水及其作品独特的价值追求，或如李泽厚所宣称的那样：走我自己的路。

《北雁南飞》第一回，李小秋的父亲看到儿子得意的样子，正了颜色喝道：“我问你，把一部《西厢记》念得滚瓜烂熟，又有什么用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，还用得着这一副佳人才子的脑筋吗？”[4]4这样看来，张恨水是用才子佳人的旧瓶装满了现实人生的新酒，试图打通新与旧、雅与俗、传承与革新的壁垒。

二、“叙述人生”、女性解放与“改造国民性”的启蒙主张

《北雁南飞》指向了张恨水自我预设的小说境界，那就是“叙述人生”，同时规避“超现实”或所谓“幻想人生”的路径。张恨水对这种思路有着清醒的认识：

“这不过是写过渡时代一种反封建的男女行为。虽然他们反封建并不彻底，在当时那已是难得的了。我若写他们反封建而成功，读者自然是痛快，但事实决不会那样。”

有此“叙述人生”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，我们就不难理解，张恨水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小说界定为“社会小说”，以社会性批判暴露旧时代的种种弊端。[3]无可否认，张恨水并没有将自己置身于文化潮流之外，对“国民性改造”这一启蒙立场也作出了有效回应。且看《北雁南飞》结尾，自认为“为时不多”、来不及解放的小秋仍挣扎着问询：“假使……假使……我要解放，还不迟吗?”师兄屈玉坚回答：“解放是不限时候的。譬如今天太阳下山了，江里的船误了行程，到了明日天亮，还可以走的呀!”[4] 这里，“解放”对应了启蒙主张中的个性解放，尤其是女性解放问题，实际上也涉及到一个更为复杂的“文化心理结构问题”。李泽厚认为，这个结构的改造转化，仅有观念变化是不能真正实现的，必须有行为模式的真正改变：

“五四及以后的年轻一代，开始勇猛地作这种改变。其中最为常见的是，个体从旧传统家庭中的出走。其原因并非经济或政治，多数是婚姻自主问题，特别是女青年反抗‘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’、追求恋爱自由而抗婚而自杀而出走。……妇女解放可以作为社会解放的某种尺度。”[2]14

《北雁南飞》中，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男女主人公的“观念变化”，但是直至结尾，女主人公姚春华仍未迈出实质性的行为模式的改变，她内心的退守、挣扎、幻想、“认命”等诸种心理因素缠绕混杂在一起，典型地体现了李泽厚所说的更为复杂的“文化心理结构”。张恨水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复杂性，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颇有深意的、开放的“尾巴”：“钟声在那里告诉人，今天是黑暗的了。向前的人，镇静着吧!明天还天亮的呵！”[4]371对照女主人公对屈玉坚“明日天亮，还可以走”这一回答的默默回味，乐观的读者可能会想见她正在积蓄力量，将来必有“行为模式的真正改变”——这正是启蒙者所愿意看到的。

三、“革命意识”与救亡—革命浪潮

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，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，二者很快合流。启蒙者也一改“批评时政非其旨也”的初衷，政治并且是彻底改造社会的革命性政治成为“焦点所在”。[2]从最初将个性解放绑缚在民族解放之中，到以马克思主义和农民意识相互渗透和塑造，构成“救亡”最为核心的意识形态，不断对“个人”进行驱逐，救亡—革命终于全面压倒启蒙。幸运的是，《北雁南飞》生成之时，救亡尚未全面压倒启蒙，民主、自由、个人观念没有遭到全面的打压和排斥；不幸的是，《北雁南飞》式的“温情主义”很快被历史主潮遮蔽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引起应有的重视。我们发现，《北雁南飞》已流露出较为明显的“革命意识”，但这一“革命”显然与科学社会主义（马克思主义）改造社会的“革命”有所不同。承担启蒙者和革命者双重角色的男主人公李小秋对姚春华说：

“我们革命军战争是为中国全民族来求解放的，军阀，固然是我们要来打倒的，便是封建社会所留下来的一切恶势力，也要打倒。为什么呢?因为这种恶势力，它和军阀的力量一样。可以剥夺人民的自由。……男女都是人，但在封建社会里，只许男子续弦，不许寡妇再嫁。女人，向来和男子是不许平等的。男子发出来的命令，女子只有接受，不许违抗。现在我们革命军势力达到的地方，不分阶级，不分男女，一律要让他们站在平等地位上……若是我们的势力已经达到，他两只手已是举不起来，那就晚了。”[4]

我们可以说，新文化运动潜埋的政治因素和要求，到《北雁南飞》这里也有所显现。不过，张恨水又以“才子佳人”式的言情外衣，调和着“改造国民性”的启蒙主张和尖锐的革命意识和政治要求。因此，《北雁南飞》的价值，确实有待重估。诚如李泽厚所说：

“五四之后，除了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救亡—革命这条道路之外，另一条继续从事教育、科学、文化等工作的启蒙方面，也应该得到积极的评价。因为它们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是起促进作用的。”[2]38

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日益错综复杂。就张恨水和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，文学社会学为我们开辟了更多有待探索、认识和追寻的领域；文学社会学也因此获益，在研究进程中不断调整、丰富和走向自己的现代形态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 [法]埃斯卡皮.文学社会学[M].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1987.

[2]李泽厚.中国现代思想史论[M].上海:生活.读书.新知三联书店,2008.

[3]陆山花,谢家顺.从《北雁南飞》看张恨水的文化认同与批判[J].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,2011(11).

[4]张恨水.北雁南飞[M].西安:陕西人民出版社,2008.

**作者简介：汤文益，池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。**